本卷是对中国思想史中与科学技术有关的部分的讨论，但作者并没有在这里给出他最后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整体上的结论，这要留待第七卷即最后一卷再做揭晓，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适的，不仅要通篇浏览过思想的部分，也要知道实践应用的成果。不过可惜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工作至今尚未结束，其中就包括了第七卷，直接阅读原文或许现在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我愿意在今年合适的时间着手尝试，到时也大概是能对本书的观点做出更合适评价的时候。

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仅就本卷中作者的部分看法给出我们的判断。

在第九章“儒家与儒家思想”部分，作者讨论的对象基本上是魏晋之前的儒家。社会现实概念，尤其是高度文化特质的概念，在漫长的时间里必然发生“忒修斯之船”般的变化，现代的主流基督徒与路德改革或者君士坦丁时期的主流基督徒有着巨大的差异，1453年灭亡的罗马帝国也几乎全然不同于屋大维的罗马。对于儒家或者道家来说，同样如此。但由于儒家名称的一脉相承，不像基督教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东正教、路德宗、新教等众多不同的名称，儒家除了少数的派别为世人所略知外，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等同视之，这当然是莫大的误解。因此许多只是一个时期一部分的特征，常常被大而化之的赋予在全体的身上。作者在分析时，难免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加之作者相当程度上要先通过其他学者的见解，儒家学说身上厚重的油彩至今尚未能够被洗清，作者的有些解释，或许走到了事实的反面。以上这些都是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姑且笼统的指出，暂不在此做具体的分析。

但作者对早期儒家与科学关系的基本判断大体还是正确的，即儒家学说更为关心人世间的政治与生活，具有伟大的人文主义特征，但却明显的对科学技术有所忽视或放在一个较为不重要的地位。但我们或许不能因此而苛责儒家做的不够，尚处在先秦至汉阶段的文明发展尚且处于“古典”的时代，此时关注社会秩序建设的思想家们或许除了个人兴趣爱好的因素，大概不会将太多的重心倾向于那个时代上没有显著回报的科学，这一点实际上中西皆同。而“把一千多年来的兴趣集中在人类社会，而且仅仅集中在人类社会”，首先，儒家至少在明之前在思想领域并不占全方位的主导，学习儒家理论的学者也可以通过其他学说进入自然探索的途径；其次，儒家思想或许并不十分关心自然的原理，但并不对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明确的抑制，部分学者仅仅是阐述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没有成为一种教条。但科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确实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没能够“独立”地进入近代的体系，这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作者明显地察觉到，道家学说中出现的矛盾心理，比如重视工匠技艺与反对技术与发明的主张同时为道家的理论所支持。其实这样“自我抵牾”的情形，在任何有足够影响力又延续时间足够长的思想派别都曾出现过。这又回到上上面说得那个问题，在历史发展中内涵的不断变化。最初名称确立之时只不过是提供了基础的概念方向，继承者常常也是发展者，在新的条件下演变出与原型并不一致的样貌。这种情形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某种特征：由于客观现实的限制，总要做出某种取舍与牺牲，但却不能不能预知选择的后果究竟是哪一种更为有利，正是在这个时候外部的或大传统的因素发挥了其几乎是决定性的方向性引导作用。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时作者运用“科学”这个概念与“正确”相联系，可以互相替换，这大概算得上是一种“现代人”的偏见。不过即使是那些做出正确抉择的人，也未必比其他人更来得优越，有时候并不是对未来在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了符合现实的判断，而只是刚好命中了唯一有利的那一个。

其实作者在本卷中也一定程度上对自己先前的结论有所推翻，作者高度赞扬了宋代学者们所构建的，在那个时代来看极为辉煌和完备的自然科学体系，而完成这项工作的恰是自认为是儒家正统继承人的理学家们。不过作者没有能够看到理学家的这套体系中，也包蕴了那些实际上抑制后来科学发展的因素，这又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我们以后还需要有专门的功夫来深入地进行讨论。背后或许正是作者所试图寻找的部分答案所在。

中国思想在科学领域中有机主义的趋向与希腊传统以来西方机械主义的偏好的强烈对比，以及未来人类科学世界观完善的可能方向，这大概是作者在本书中做出的最大胆与富洞见的猜想，而我们究竟离这个还有有么遥远，尚不得而知。止就本书所包含的材料来看，至少在伽利略之前，东西文明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各有所长的评价或许来得更为真切，就成果来说无疑如此。此时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一脉还是希腊传统这一支，科学成就并无显著差距，而前者在“近代化”过程的落后，问题并不出在前置理论体系的准备上。

到底来说，作为先驱者而言，李·约瑟的工作已经做的相当好了，许多的问题还有着无数继续研究的空间与必要，想要在一个相当空白的领域探索出些真理来，还是需要持久的努力。可惜的是，后不见来者。